

梅櫻二集

沈西城 著

黎漢傑 編



目錄

梅之卷

梅櫻二度開落	黎漢傑	vi
梅櫻集序	沈西城	iv
奇女子李香蘭		002
喀什噶爾遊記		022
我所認識的郁達夫		034
郁達夫的〈鹽原十日記〉		041
最新發現的郁達夫資料		055
有關魯迅作品的日譯		064
記我的叔父藤野嚴九郎		071

《阿Q正傳》日譯者——井上紅梅

078

追悼魯迅三友

087

《人民中國》日文雜誌主催：京劇前途座談會

094

金庸小說在日本

113

櫻之卷

我與推理小說

120

武者小路實篤淺談

125

迷失、彷徨的村上春樹

130

從新感覺派到新興藝術派

136

閒話東洋歌舞伎

156

默默耕耘的老人——記翻譯家本橋春光教授

169

東洋刀劍今昔談

175

日本武士道與西歐騎士道	195
日本作家寫稿的怪癖	199
松本清張先生印象記	203
井上靖其人及其作品	244
跋	268
文章發表記錄	269

梅櫻集序

沈西城

四十七年前，我寫了《梅櫻集》，到今年二〇二三年，相隔四十七個年頭，方再出版了《梅櫻二集》。《二集》裡的文章其實亦多寫於七十年代中期，我二十七、八歲的時候，作品看來並不太成熟，可是，有幾篇如今看來，似未過時，尤其是〈新感覺派與新興藝術派〉一文（刊七六年的《明報月刊》），介紹日本近代兩個著名的文學流派以外，還隱含着我的文學觀——「反對隱晦難明，文字歐化。」當年以為會有附和追隨者，結果寥寥無幾。四十餘年後的今日，這種早被日本文學家摒棄的文學觀念，仍舊行屍走肉地存活着。實質上這兩種文學流派存世的時間並不長，發起者之一川端康成，一早就

棄甲而逃，否則便成就不了獨特的川端美學。諾貝爾文學獎發言人在頒獎感言上，這樣說——「川端先生用他『獨特』的文字，記敘了日本傳統文學裡面的美麗與悲哀。」那一年，同時進入最後五名入選者名單的三島由紀夫，在日本文壇一片看好聲音中，慘遭滑鐵盧。望文生義，就是沒有本土的根，同一道理，村上春樹屢敗於諾獎，亦是過於西化。老朋友本橋春光教授說過：「要知一國文學必要有本土的根，可以吸納外人進步的文學思想，絕不可套用西洋化、非驢非馬的文字。」我慶幸自己四十多年前，已看通了這一點，跟老同學也斯一早分道揚鑣，期間受盡冷待、藐視，雖千萬人，西城往矣！我還是覺得自己所走的路是正確無誤的。除了〈新感覺派〉，還有記述松本清張、井上靖、東洋歌舞伎、東洋刀劍等的幾篇文章，花了不少心思，希望我的讀友們都能得讀，你們的喜歡，正是作者最大的榮耀和幸福。

二〇二三年五月中旬序白於迎海樓

梅櫻二度開落

黎漢傑



二〇二〇年，我替西城叔叔復刻了一九七六年波文出版的《梅櫻集》，和我說其實當年還有寫過、翻譯過不少和日本有關的文章，只是後來沒有結集。現在年紀大，發表在哪裏，也忘記得一乾二淨了。我就拍胸口話，包在小朋友身上。叔叔倒一臉疑惑地問，真有辦法？

幸好以前任職大學研究助理，找資料，對我不難。從香港、台灣兩地大學的資料庫，找到不少叔叔文章的發表記錄，粗略計算，就有《大大月報》、《大任》、《大成》、《七藝》、《南北極》、《明報月刊》、《明報》、《星島日報》、《益智》等報刊，另外加上一篇收錄在他翻譯松本清張《霧之旗》的訪談記（當時是作為代

序），已達十萬字之數，傳給叔叔，他立即打來，欣喜重見出土文物之餘，更對我感慨：原來當年寫了那麼多，想不到，真想不到！

本書名曰《二集》，文章重點之一自然是延續《梅櫻集》中日文學、文化交流這個課題、尤其是魯迅、郁達夫，佔了不少篇幅。郁達夫的主要關於考據郁氏生平，魯迅部分則涉及日本友人交往、作品日譯源流。其他如陳舜臣、李香蘭等，則讓讀者了解著者的生活面貌，尤其李香蘭，在當年李氏自傳還沒有完整翻譯出版，可說是非常有價值的文獻資料。

至於如《東洋刀劍談》、《日本武士道與西歐騎士道》、《日本作家寫稿的怪癖》等介紹日本文化，取材理趣兼備，同時切入比較視野，即便是今日出版的同類著作，撰寫的角度也大抵不過如此。

最後，也是篇幅最多的，就是關於日本作家的文章。如果說《從新感覺派到新興藝術派》與《井上靖其人及其作品》資料詳實，條分縷析，梳理文學流派與個別作家細緻入微，是以理勝；則《默默耕耘的老人——記翻譯家本橋春光教授》與《松本清張先生印象記》以人為中心，有故事，也見到作者自己的身影，就是以情勝。兩者相比，我更喜歡後者這一類文章。本橋春光與青年沈西城的相遇，意外造就了一本

《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的誕生，收錄其中的就有劉以鬯作品《對倒》的短篇版本。雖然，書本面世過程一波三折，但最後還是順利出版，可說是港日之間一次特別的文字因緣。

至於〈松本清張先生印象記〉，以一萬多字的長卷，敘述一日之內兩人的相處，除了知曉松本清張創作小說的背後功夫，更難忘的是，對松本清張的推理小說，沈西城與松本清張自己的評價與分析，這點尤其難得。難怪，這篇多年舊文已有日譯本，刊載在《松本清張研究》年刊了。

回顧這批文章，大多寫於七十年代，當年還是風華正茂的沈西城，會否想到曾經摘下的片片櫻花與梅花，五十年後還有機會再看到二度的開落？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梅之卷



奇女子李香蘭

李香蘭著，沈西城譯



童騷之時，喜聽時代曲，歌者芸芸中人，獨喜李香蘭。家父有友多為東洋人，便中輒談及李香蘭的事蹟，那時少不更事，聽後多便遺忘；挽近讀報，得悉李香蘭已獲選為議員，以女流之身，得廁政界，殊不簡單，因而引起我對她過去一段生涯探討的興趣。

李香蘭實在可稱為奇女子而無愧，她的北京語說得要比一般中國人漂亮，風姿美韻尤為一般中國女子所不能及。她生於中國，育於中國，跟中國的歌唱、電影界都有着相當密切的關係；在今時今日看來，這一切都似已成陳跡，不過，若果當作掌故來說，未嘗不可作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佐。手邊存有一些資料，趁着有閒工

夫，順便抄錄一些來作介紹，原文登載於一九七〇年十月號的日本雜誌《中國》裡，作者便是李香蘭自己，故行文均以第一人稱；此處為保存真實感，不擬竄改成第三身了。

童年的生活

我於一九二〇年生於滿州撫順，為六姊妹中的長姊。父親生於日本佐賀縣，已於一九六八年去世。我父為中國留學生，在北京同學會那兒讀書，他本是一介平民，卻能廣結中國朋友，這實在是我父的人緣好。

父親的事，我知之不詳，他跟母親



● 年青時候的李香蘭

是在中國結婚的；那時候的事，迄今還留在我記憶裡的，大概是在讀幼稚園或一、二年級時，跟父親學北京話的事。撫順有間叫做滿鐵的公司，父親跟他們有點關係，便在夜裡教公司職員講北京話，他常帶我一塊兒去，這是我最初跟北京話發生關係的經過。

打從小學至中學二年級為止，我讀的都是日本學校，因之養成我能讀日本語和寫日本字的能力，倘若一開始便進中國學校，我相信便不會懂日本文的了。這之後，我便到北京讀書。那時日本政府提倡「五族議和」（即滿州、朝鮮、蒙古、日本、俄國五民族），我便是在那種光景下渡過了少女時代。

李香蘭名字的由來

在中學二年級時，我家由撫順搬至奉天（今瀋陽），這段時期，對我來說，可謂決定了自己的人生，李香蘭的名字便在那時產生的。

瀋陽有一位李際春將軍，是瀋陽銀行的總裁，跟我父親很熟落，於是我便認了李將軍作乾爸爸，又叫李將軍的太太為乾媽，女兒為乾妹妹。

在李際春將軍的生日宴會上，舉行了認乾女兒的儀式，李將軍替我取了「李香蘭」的名字，又把我的妹妹悅子叫做「李悅蘭」、誠子叫做「李誠蘭」，我們姊妹皆姓李名甚麼蘭的。

學歌的開始

有關我學唱歌的經過，說來話長……。在撫順女校讀書時，我成績雖不惡，卻很怕數學這一科，但是，我的歌唱得不壞，上音樂課時，多能取得好分數。不久，我家搬到瀋陽，大概是那時候前後的事吧！我患上肺病，在家療養了大約半年的光景。那時候，我很覺煩悶。俄籍女友留巴齊嘉，與我年紀相若，我們很談得來，她家開了一月麵包店，平時我管她叫留巴姊，大家常手牽手的在街上散步，這時我不過是十二三歲左右。留巴姊很同情我病中的煩悶，便提議我去學唱西洋歌曲。那時，瀋陽有個很出名的歌唱家叫做波多里索芙夫人，留巴姊便帶我到她那兒去。

我們兩人到了那裡，波多里索芙夫人自彈自唱，一曲既畢，便指令我試唱，我大吃一驚，使用蚊子哭叫般的聲音唱起來。之後，留巴姊跟夫人用俄語談了一會，便着

我稍等；我走出那鋼琴室，在地下等着。不久，留巴姊來了，告訴我夫人着我下週起，每個禮拜來一趟。

用李香蘭的名字唱歌

在未赴北京前，我一直跟隨波多里索芙夫人學歌，因此，也就漸漸能唱了。學歌的開始，夫人規定要唱藝術歌曲，她教唱的幾乎都是俄國歌。我的歌腔鏗鏘，便是那時用俄國發音法打下根基的。

瀋陽有一片叫做大和的大酒店，在那兒，夫人每年都有一趟演唱會。波多里索芙夫人的演唱會，很能招引一班上流人物，是當時瀋陽的一大盛會。那時，我已擔當助演。大概到了十四五歲，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在大眾面前，唱了四隻歌，唱得不好，拍手的人卻很多。

有人很欣賞我的歌藝，走來跟我商洽，那人便是瀋陽放送局的東先生，他希望我能在電台上唱歌。東先生正計劃籌備一個叫做「滿州新歌曲」的新節目；用現時的話來說，即是所謂「流行歌曲」。東先生要找唱這類歌的中國人，卻一直找不到，我既

然懂得中國話，唱這類歌當然是沒問題了。東先生跑來我家，懇求我在電台演出。這種步進藝壇的事，是我做夢也沒想到的……。於是我決定去唱，但是用什麼名字去唱好呢？用「山口淑子」——我的日本名字去唱中國歌，當然不很合適，經過一番商議，我既然有李香蘭這個中國名字，東先生就認為索性取來一用好了。

我在唱「滿州新歌曲」時，擔當一個叫李香蘭時間的節目，唱了很多中國歌曲，至今我還記得許多民謠與流行歌曲。此外，中國的古老歌調，到現在仍存我記憶中。



● 奉天女子商業學校舊照

到北京讀書

我是一個人去北京的。因為家裡從撫順搬到瀋陽時，我進不了「奉天女校」。學校已滿額，再也不招學生了；但是那兒還有一片叫做「奉天女子商業學校」的，尚有空位，我便投考進去。商業學校有珠算及簿記課，搞得我很慘。我不堪煩惱、便發牢騷。我父沒辦法，就送我到北京進中國女學校去。我從瀋陽乘三等車，過山海關……我周圍都是中國人，沒有什麼日本人，但賣票的是日本人，我還記得很清楚。

是昭和八年左右吧（一九三三年）——冀察政府已成立。我在北京棲寄冀察政府政務處長潘先生家。潘處長替我起了一個「潘淑華」的名字，送我進了「翊教基督女學校」。潘處長有兩個女兒，我就成了他第三個女兒。我穿着中國木棉青制服，跟兩位小姐一起住宿，每日同乘黃包車到學校去。那時，在北京西城的學校區，抗日示威很盛，我讀的「翊教女校」亦無例外，日本是不准進校的。因此潘處長才要跟我起個中國人的名字。噢！就是那時開始，我接受了純粹北京話的教育。雖說跟我父學過北京話，但所進的是日本學校，回到家裡去，說的又是日本語，北京話要捲舌頭兒，我雖能勉為其難，然而所識的生字卻不多夠用。

那時，北京抗日很厲害，被人家知道是日本人就很危險，我唯有拼命學好北京話。在未能說得流利，不露破綻時，在學堂裡上課，我就如啞巴一樣，文靜得很。

想做政治家的女秘書

潘處長家常有大人物出入，像王克敏、吳佩孚等。潘處長的家很大，男女傭人就有百人之多。潘處長有妻兩人：住在東廂，專責生產的，叫東夫人；住在西廂，管教養的，叫做西夫人。東夫人儀容美麗，纏小足，兩位夫人是同時跟潘處長結婚的。

每有大人物來時，都引進裏室去。潘處長跟他們橫臥床上吸鴉片。鴉片是需要人燒的，這大多數是由兩位夫人或女兒來任命；如用了外人，恐怕會洩露談話的秘密。我有時也替他們燒鴉片，但是他們說些什麼呢？我年紀小，都聽不懂。那時，我很希望能成為政治家的秘書，這因為常聽他們的秘密會談，令我對政治產生了某程度的興趣。

女學生時代的事，我還能想得起的，是「太廟」這地方。那兒古木參天，在樹蔭下，有許多女學生聚在一起，邊做功課，邊讀書；喝着中國茶，又吃着蜜棗，大家就

這樣地談着話。然而，想起北京的學校生活，可悲的總要比可樂的要來得多。

北京有一處名曰「中南海」的地方，那兒的池畔有亭子；一俟晚上，學生們便聚集在那兒。男學生也有參加，想起來約有十四五人吧！大概是七七蘆溝橋事變之前，仔細日子已記不清楚，總之是中國軍跟日本軍之間情況已甚緊張的時期。我也被邀請去參加他們的集會，因為他們都不知道我原本便是日本人。我們談到一旦日軍進攻，學生們應該怎麼辦的問題。抗暴嗎？打游擊戰嗎？還是一走了之？

那時期，還有其他集會；談到萬一日軍攻破北京城，又如何辦？為了不要讓日軍攻進來，大家都嚷着要奮戰到底。被問及我怎麼辦時，我覺得很窘，很難回答這問題。我想了想回答說我會首先登上城壁，當「炮彈灰」，就讓我率先去死吧！在我來說。當時實在找不到其他的話，我感到淒涼，故而這樣說了。

我的乾哥哥川島芳子

我現在要說起川島芳子來了。潘處長後來移任天津市長，因此到了暑假，我們一家都到天津玩去。唉！還是女學生時代的事，在一個宴會裡，偶然遇見了川島芳子，

當時她叫做金璧輝將軍，聽說本來還是清朝肅親王第十四位女公主呢！她穿了軍服，是她一生中最輝煌的光景。她很喜歡我，她女扮男裝，風度翩翩，跟我結拜做了兄妹。川島芳子很風流，有許多女朋友繞在她周圍，她的客廳時常都非常鬧熱。

我從她那兒得到了一襲粉紅色的洋服，尺寸正合我身材。川島並不見魁梧，但是很討人喜愛。我們遠離了天津大約有一個禮拜左右，過着日夜顛倒的生活，子夜吃午飯，暢遊常至達旦，對我這十五六歲少女說來，實在不能過這樣的生活。

這以後過了多年，我在北京真光戲院碰見了川島。上演前幾分鐘，有一班軍人推開人群進入了戲院。我坐在前廂，跟妹



● 穿軍裝的川島芳子

妹坐在一塊兒吧，不知誰進來了，只見眾人都把視線投向那邊。看清楚，原來便是川島，她肩膀上棲着一隻猿猴。休息時，川島站起來，說這電影無聊；她就是喜歡這樣搞的。

日本敗戰時，在北京我又碰到已經不再是金將軍的川島。她穿着中國女裝，肩膀上仍棲着猿猴。我們一起吃飯；席上，她在足部上注射嗎啡，大腿肚子滿佈着紫色針跡。戰後川島被判為漢奸，據說就在北京被槍斃掉。

進入電影了界

我之進入「滿映」（偽滿官辦電影公司），純出於偶然。那時我希望做一個政治家的秘書，並不曾想到進電影界去。

某日，日軍報導部的山家少佐差人到潘家訪我，我到了會見的地方，才知道原來是約我拍音樂劇。「滿映」曾派人找過唱「滿州新歌」的李香蘭，知道不在滿州而是去了北京，山家先生便覓人苦找。山家少佐是我父朋友，在撫順時，便常來我家遊玩。

正因如此，我答應了拍電影。起初因為主角不懂唱歌，說好我只作幕後代唱。不

料一俟正式開拍，我竟被任命為主角。這部電影便是《蜜月快車》。

拍好《蜜月快車》後，為了要參加什麼博覽會的，十八歲的我才首次踏上日本的土地。同行有「滿映」女明星孟虹，我們隨着近藤伊與先生從釜山乘船到了下關港；初見祖國河山，不勝激動之際，突然傳來日本軍官的罵聲，那些話至今我猶不能忘記。落船時，警察官檢查護照，孟虹下船後，便輪到了我。護照審查完畢待要走時，又把我叫了回去；「再給我看看護照！」那警官叱喝着，向我細細打量。在眾目睽睽之下，又怒道：「你是日本人吧！幹嘛要穿『搶哥魯』（辱罵中國人的話）的服裝，一等國民竟然穿着三等國民的衣服，不覺羞恥嗎？」第一步踏足日本，便聽到這樣的話。聽不懂日本話的孟虹很驚恐的問我，到底出了什麼岔子。但我怎能夠說實話呢！

此後，我又拍日本電影，那是跟長谷川一夫合演的《白蘭之歌》上下集，與《支那之夜》。《支那之夜》在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在日本上演時。引起了很大的騷動，那便是著名的「日劇七圈半」事件。《支那之夜》在日劇上演時，我曾隨片登台，那日恰巧是二月十一日「紀元節」（日本開國紀念日），前往皇宮「遙拜」的學生們在回程中都擠來日劇處排隊購票，是騷動的主要原因。

山家少佐的愛情悲劇

我現在想來說有關介紹我進「滿映」的山家少佐底事情。山家先生能說很好的北京話，他跟中國的緣分很深，可是他的收場着實很悲慘。

山家少佐是川島芳子的初戀情人，兩者間有很熱烈的羅曼史，有一時期，我深被川島恨着，因為山家先生介紹我進「滿映」，川島就有了很大的誤會。當然，我跟山家少佐原無任何關係，但川島嫉忌，當然向軍司令投書，要把我判獄。山家少佐並不英俊，只是他很受女性歡迎。在上海報導部治事時，他跟一個中國女明星鬧戀愛；環繞着他身邊的，便有兩個女明星，於是造成三角戀愛。正因如此，山家少佐便惹上了官非。原因是其中一個女明星向東條英機密告山家少佐為反間諜者，結果山家少佐被褫奪軍階，關在名古屋監獄裡。

我從中國回到日本，剛開始為東寶拍電影時，山家少佐突然來訪。他向我告貸。他說他是趁監獄被轟炸時逃出來的。那時，我因要照料雙親及兄弟等，才剛恢復拍片，收入也僅堪糊口，就只好拒絕了他；他又要求我收養他前妻的女兒，我答應了。那女孩子第二天便來到我家。

數月後，我在「大船」（地方名）拍片，報館打電話到我棲息的地方來，問我認不認識山家少佐，這是深夜的事情了。我說認識，對方又問那女孩子（即收留在我家的）是不是我跟山家所生。我聽後大怒，那女孩子已十六歲了，我不過二十多歲，那麼我豈不是十歲就生孩子了嗎？記者先生又告訴我山家少佐自盡身亡的消息。屍體被發現在山梨縣的甲府山中，野狗啣着他底腐爛的頭部；屍體側有遺書兩封，寫給我的，着我好好照料其女兒，記者大概就此穿鑿附會了起來，也說不定。

還有更不幸的事情。我到美國那段時間內，那個女孩子竟然服食安眠藥死掉了。她真是一個美人兒，可惜有肺病，在一所酒吧裡做事，聽說也有了戀愛的煩惱……。

成了紅影星

我之能廣被人所認識，還是在加入上海「中華映畫」（即「華影」，董事長為汪政府宣傳部長林柏生，副董事長川喜多長政、總經理為張善琨），主演了《萬世流芳》之後的事。《萬世流芳》取材於鴉片戰爭，着意描寫被英國侵略時期的林則徐。這電影十分賣座，特別是我在這電影裡面唱的「賣糖歌」，使我受到了觀眾的注意，這是昭和

十七年的事（一九四二年）。

那時中國的文化中心，無論怎樣說，都非上海莫屬。我所隸屬的「滿映」，從中國整體來看，不外是滄海一粟。因此，要得到中國人認識，就非得成為上海明星不可。《萬世流芳》集合了當時全中國最優秀男演員王引、高占非，女演員袁美雲、陳雲裳等，陣容鼎盛之極。

後來，我又回到北京去，跟中國記者見了面。記者大約有百人左右，都問我有關在上海的事。

我在上海拍戲時，因為「李香蘭」這名字有過許多麻煩。同事們對日本的侵略，與及日本製造的傀儡政權，多有憤恨之言，但這都不能說出來，對他們來說，是多麼痛苦呢！我亦已長大了，對這種一方面施以懷柔，另一方面不斷用武力壓迫的日本政府的政策，亦很明白，我真不想用「李香蘭」這名字了。上面曾提過陳雲裳女士，她曾有過很不如意的事。那時上海停泊着日本軍艦，日本軍方希望明星上艦慰問，起初明星們拒絕，後來因為軍方答應不以明星們此舉作宣傳，陳雲裳一眾方肯去進行慰問。可是，到了第二天，報紙上卻盛大加以報導這趟「中日親善」，因此，罵陳女士為「賣國賊」的信件及電話紛至沓來，急得陳女士在拍電影時也忍不住哭起來。

這種事是常有的，但是中國人當着我面時，都愛說真心話，如果有日本人，即使只是一個人，他們便會中斷談話。不能背叛中國人的心情，那時候於我是十分強烈的。以我來說，「李香蘭」這名字是不大有利的，它常常成為「眾矢之的」。我的國籍是日本人，慰問日本兵隊，當然不好拒絕，處身這樣的「進退維艱」處境中，我有着不能任意轉動的苦況。

有關《支那之夜》

我所會見的中國記者們，都知道「李香蘭」是日本人這件事實。在會見記者之前，我見到了新聞記者協會會長李先生（李先生也是我父朋友），我告訴他我的原來名字是「山口淑子」，住在中國北京，父親叫做「山口文雄」，是一個愛中國、住在中國的男子，我也是一個愛中國的日本女性，我很想把這事實公諸記者，但李先生勸我不要這樣做，他說今日聚在這兒的人，都認為「李香蘭」乃是上海文化界裡面的大紅星，他們認為「李香蘭」是北京孕育出來的明星，所以他們欣喜的聚在這裡。我很明白李先生的心情……。

北京飯店的記者招待會中，大家都問我上海的近況與及有關拍電影的情形，在快要結束時，有一個青年記者向我提出了問題，他說李香蘭小姐，你拍錄《支那之夜》這類辱華電影，作為中國人，你有什麼值得自豪的呢？我當時欲言無語，真想說出我是日本人。我應該說些什麼呢？過了數秒鐘，很自然地出自我嘴裡的是一「我錯了，真對不起」這幾句話。「我因為年少不懂事，下不再犯。」說完之後，大家都拍起手來；我含淚離席，這事我想起來，永世難忘。

《支那之夜》在日本亦同樣哄動一時，「李香蘭」的名字在日本從此不脛而走；但在中國，雖然起了哄，卻帶來許



● 之後曾改名《上海之夜》上映的《支那之夜》

多指責。在這部電影中，我扮演一個中國少女，跟長谷川一夫相戀，電影裡，我雖被長谷川摑耳光，還深愛着他。這境遇也是只有日本女性才有，中國女性很少有被戀人毆打後還深愛對方的。我決心不再拍電影，於是到上海拍告別作《香妃》。這電影的導演和工作人員與《萬世流芳》是原班人馬，在撰寫劇本階段時，日本被打敗了。那時電影界人士，多逃到香港去，我跟陳雲裳女士在香港見過面，現在她已成為醫生太太，過着幸福的日子。

歷盡滄桑始得回國

我因為收聽收音機，知道八月十日，日本將會因戰敗而宣告投降。在上海的日本人都如此想，只有日軍還不曾知道。敗戰前三日，我接到報導部命令我要去慰問軍部，我就在茫然無所知的兵士面前唱着歌。

「日本降伏詔敕」宣佈了後，我乘着黃包車巡迴上海街頭。友人警告我街外危險，少出門，但我個人感到激動。日本旗被扯了下來，「青天白日」旗幟飄揚着，我流着眼淚，獨自說着「這真好，這真好」。

終戰之後，過了一個月，即九月二十日，我們跟「華影」有關係的人，被收禁於虹口的一處地方，過着被監視的生活。那時街中張貼着「認為李香蘭是中國人，可以證明其為間諜者，請快到司令部」的佈告。被收禁約數月後，我被裁定有罪，法庭要我戰時中的行動（指參與《支那之夜》演出）公開謝罪；那樣做了後，我被釋放。我是日本人，沒有幹過間諜行為，他們都調查得很清楚。

昭和廿一（一九四六年）年三月一日，我從上海出發回國。上船前接受檢查之時，一個中國女警官認出了我，於是我又一次的被抓了回去。那時候，中國報上激烈攻擊三個文化漢奸「川島芳子、東京



● 李香蘭的自傳